

统治者偏好、有限理性 与封建王朝周期性兴衰

杨德才 刘冰镜

内容提要 近年来,封建王朝周期性兴衰问题逐渐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在诺思的暴力潜能理论及奥尔森的国家起源理论基础上,通过理论和模型的分析,可以得到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对制度变迁起决定性影响的结论。多数情况下,统治者偏好和有限理性使得统治者在决定制度变迁、制度安排的时候,总是将统治者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以致造成制度的效率损耗或效率低下,而制度的效率又决定着封建王朝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周期性兴衰。

关键词 制度变迁 制度效率 代际偏好 有限理性 王朝周期性兴衰

杨德才,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教授 210093

刘冰镜,南京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硕士研究生 210093

一、文献综述与问题提出

纵观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史,从一个王朝的兴起、鼎盛、衰落直至灭亡,再到一个全新王朝的建立,周而复始,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国内外学者对于王朝兴衰问题的研究从未中断,并试图找出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呈现周期性变化的原因。史学家王毓铨(1936)认为税赋加重与王朝更替息息相关,他以明朝为例,认为正是赋税的不断加重,促使了农民起义,导致了明朝的覆灭;史学家黄仁宇(2001)认为税收制度与王朝周期性更替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他重点分析了明朝的财政管理体制,提出定额税制是导致明朝“洪武型财政体系”崩塌的主要原因;学者刘太祥(2011)指出君主专制体制的专权会深化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而人治则会激化农民阶层与官僚阶层之间的矛盾,因而这种专制政体是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周期性更替的关键原因。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另辟蹊径,提出了较为新颖的观点。例如,学者黄冬云(2004)以隋炀帝为例而认为统治者的各种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其个人性格的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中国封建王朝兴衰周期律研究”(批准号 15BJL063)阶段性成果。

影响,由于封建社会的君主专制性,统治者治理国家的政策及行为直接关系到王朝的发展趋向;再例如,杨德才等(2016)从制度效率的角度出发,认为封闭的制度供给环境及信息的不对称性导致了封建王朝制度僵化,而外部环境与僵化制度的脱离使王朝呈现周期性兴衰。

就国外学术界而言,从历史视角研究王朝兴衰的代表性学者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和著名经济学家曼瑟·奥尔森等。诺思(2013)提出的暴力潜能国家理论,从制度的角度解释了暴政存在的原因。即统治者所在的强国周围没有可以与之匹配的竞争对手,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诺思认为,国家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并且处于一种界定和行使产权的状态;国家的界限划分表现在统治者对其民众征税权利的限制方面,并且正是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丛林战争中诞生了统治秩序,统治者是作为公共权力的象征来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行。从诺思的上述理论可以看出,西方世界的国家权力与产权是分离的;但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权利与私人产权则是一体的,统治者是王朝的所有者,对官僚集团和农民享有绝对的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因而,统治者对于王朝的绝对掌控使得其行为对王朝的兴衰至关重要。奥尔森(1993)提出了国家兴起的“流寇坐寇”理论。即当依靠暴力敛收财富的流寇发现征税是一种比抢劫更有利可图的方式后,就会建立税收制度形成国家秩序,由“流寇”变成“坐寇”。中国封建社会的君主制就是“坐寇”理论的典型例证。王朝因为君主专制的存在而变成了统治者的私人产权,公私合一。国家权力和私人产权的“二合一”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这势必会导致统治者无法同时实现租金最大化和社会总产出最大化,即造成统治者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与社会福利最大化之间的矛盾。这时,统治者的偏好就与王朝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时,税收制度也是“坐寇”理论的具体表现。税收收入是一个王朝的主要财政来源,统治者向农民征税,再将税收用于维持王朝的正常运行。然而,统治者的有限理性会影响税率的制订标准,从而影响王朝的兴衰。

纵观整个中国封建历史,一个统治者想要其王朝长久的存在,其所面临的真正最大威胁就是农民起义。因此,在“理性人”假设前提下,统治者需要建立一套制度体系,使其既能从农民那里获得利益,又能维持他的专制统治。从理论上讲,统治者若是完全理性的,他追求的应该是社会福利最大化,使农民丰衣足食、生活安稳。从历史上看,农民中的大多数是风险规避者,当其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自然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去揭竿而起。然而,统治者作为管理者,其理性是有限的,他需要在社会福利最大化、自身收益最大化以及子孙后代的长期收益最大化之间做出选择。不同的选择,对封建王朝的运转及其发展、覆亡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最高统治者究竟做出怎样的选择,实际上是受到统治者个人偏好、有限理性约束的。所谓统治者偏好,是指影响统治者决策或选择行为的个人意愿或意识形态,包括个人爱好、个人阅历、习惯、思维方式等。一般而言,统治者的代际偏好与其当期消费量成反比例关系,即代际偏好越低,统治者越偏好于当期消费,后代君主对其贴现效用越低,王朝也因此而可能越动荡。通常来讲,每个个体偏好的差异是很大的,并带有明显的个体主观色彩。代际偏好是指在位统治者对其后任统治者的关心度。代际偏好高说明在位君主越关心后任君主,他在做选择时越考虑其子孙后代的长期收益。本文将重点分析统治者的个人偏好和代际偏好,即统治者进行改革的意愿和其对子孙后代的关心程度,并将统治者的有限理性具体化为其对农民征收的税赋上,以便于对统治者偏好、有限理性与王朝兴衰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二、制度变迁、制度效率与王朝兴衰

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写道:“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更确切地说,它

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纵观历史,制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总是在不断地进行着变迁。诺思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不均衡时人们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过程。统治者作为一个国家的管理者,他追求长期收益最大化,当现行制度的运行不能使潜在获利机会变为现实时,统治者就会选择进行制度变迁。

著名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从资源配置效率角度定义了制度,他认为有效率的制度是能够将社会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那些制度。然而,统治者的效用函数是其偏好的具体表现,从根本来说是主观的。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相比,统治者考虑的是其自身福利最大化而不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所以,在绝大多数时候,统治者并不考虑所谓的制度效率(或制度的有效性),而仅仅考虑自身福利、当期利益。当然,统治者追逐自身福利并非是随心所欲、不受任何约束的,而是受到两方面的约束:一个是参与约束。即统治者追逐自身福利最大化是以维持自己政权的稳定为前提的,也就是要满足农民的最低生活需求以确保农民不会发生起义;另一是交易成本约束。一个王朝或社会交易成本的大小直接影响着制度效率或统治者的自身福利,而交易成本的大小是统治者决定是否进行制度变迁的关键因素。

一般而言,封建王朝统治者实行的制度安排影响着制度效率,而制度效率的大小又影响着王朝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制度变迁的效果好,则王朝经济发展水平高;制度变迁的效果差,则王朝的经济发展水平低,因此,制度效率直接决定了王朝的兴衰进程。然而,每一项新的制度安排都是有成本的,其成本取决于用于新的制度安排的人力资本和其他资源要素的价格。因此可以说,最有效率的制度实际上就是能将交易成本最小化了的制度。对于统治者来说,是否进行制度变迁所需考虑的影响因素除了交易成本外,还有现行的制度安排。这是因为制度变迁存在一种自我强化机制,即现行的制度安排会对以后新制度的供给产生影响。

成本最小化只是为制度变迁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制度到底会不会变、多大程度上变,则主要受制于制度变迁的直接决定者——最高统治者对其个人收益成本的比较。这是因为,封建统治者是否进行制度变迁主要是基于其自身福利最大化的考虑,也就是说,即便某一项新制度对农民集体是有效率的,但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无效率的,那么该制度也不会被采纳。因为统治者作为制度变迁的决策者,会优先考虑其自身利益,只有在其个体利益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才会考虑社会利益。所以,即使一项有利于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制度,但只要与统治者的个人利益不相一致,其就不会被安排实施。基于统治者个人偏好、个人利益而难以实施的制度变迁又深深地影响着现有制度安排的效率。

诺思提出,“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基础性的作用,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基本因素。”一个国家或社会的交易成本越高,其制度效率越低。制度效率直接影响着社会的产出水平,进而影响经济绩效的大小。而经济绩效水平是衡量一个王朝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中国封建社会,农业是一个王朝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王朝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农业税收,统治者的制度变迁行为往往从税改开始。农业税收与经济绩效正向相关,农业经济绩效越高,农业税收越多,反之则越少。统治者将税收收入用于维系王朝的正常有序运转,如军事供给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方面。因此,高的农业税收收入有利于王朝的发展建设,而低的农业税收则会使王朝的发展水平趋于缓慢。因此,一个王朝的制度效率越高,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而王朝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王朝的长治久安。

当制度变迁的效果越好时,农民的生活就越富足。当农民的生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时,进行起义这样的高交易成本活动的概率越小,因而王朝的统治环境越稳定,越有利于统治者维护其政权的稳定性;反之,当农民食不果腹、生存艰辛时,揭竿而起似乎就成为了唯一出路,社会因之失去稳定,王朝因之变得风雨飘摇。因此,制度变迁效果与王朝兴衰息息相关,制度变迁效果越好,王朝越繁荣;制度变迁效果越差,王朝越衰败。由此可以看出,制度变迁效果决定着一个王朝的兴衰程度。

三、统治者偏好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在中国封建时代,封建帝王既是整个国家的统治者又是整个国家的所有者,享有对整个社会全部收益的控制权和支配权,没有一个统治者不希望自己的江山永固、帝业永传。为了子孙后代考虑,统治者是有积极性管理国家,并从长远角度对王朝进行制度建设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封建最高统治者应该考虑的是使其长期贴现收益最大化,在统治者在位时期应尽量避免竭泽而渔,以保证其子孙后代的收益。按照诺思的理论,对于统治者所在的政治市场,虽然并未出现现时竞争对手,但是存在随时可以进入市场的潜在竞争者。统治者为了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势必会采取较低的税赋水平和较高的工作努力程度,以此来阻止潜在竞争者进入政治市场。当统治者处于低税赋和高工作努力程度时,政治市场存在很高的壁垒,潜在竞争者很难进入或者进入市场的机会成本过大,此时潜在竞争对手进入政治市场将无利可图,统治者由此成功地阻止了潜在竞争者的进入并实现长期收益最大化。

然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国家权力与私人产权合二为一的前提下,统治者是将国家当成私人产物进行管理的,他追求的是个人收益最大化。统治者愿意履行对国家的管理职责也是因为他要维护自身的产权,这也意味着统治者身上同时背负着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双重目标。而统治者如何分配投入在这两个目标上的资源禀赋及时间精力则完全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预期。对于农民来说,虽然统治者履行公共管理职责时具有非常明显的正外部性效应,但毫无疑问,这类正外部性效应也仅仅是副产品。这是因为,统治者决定公共资源分配是完全出于自利目的的,与社会福利最大化相比,统治者总是以自身效用最大化作为管理国家的目标的。康熙帝曾说:“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身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必躬自断制。”因此,当统治者意识到王朝的制度运行出现问题,试图进行制度变迁时,他对制度变迁效果的评估就取决于其自身的效用函数。为了反映统治者偏好对制度变迁效果的影响,构建下述简单模型:

$$U_t = U^p - U^n \quad (1)$$

在这里, U^p 表示制度变迁的正效用,反映统治者通过制度变迁获得的效用大小,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努力工作程度和统治者进行改革的意愿和行动力度; U^n 表示一种“竞争约束”,统治者在进行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推行的相关政策可能会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时相关利益集团就会想方设法阻止统治者的变革,就形成了利益集团对统治者的竞争约束。这里的 U^n 主要来自于相关利益集团的阻力。

$$\text{其中, } U^p = T_1 + \Delta T - C(e)\beta^k \quad (2)$$

$C(e)$ 为统治者努力工作的负效用,即统治者因为努力工作而放弃的休息享乐时间的机会成本。这里将 $C(e)$ 简化为一个线性函数 $C(e) = \alpha e$, α 为负效用系数, e 为统治者努力工作的程度。 β 表示统治者进行改革的意愿和行动力度, k 表示强度,则 $C(e)\beta^k$ 就表示统治者在不同改革强度下所需付出的机会成本。

$$T_1 = \frac{1 - \delta^n}{1 - \delta} T \quad (3)$$

$$\Delta T = \frac{1 - \delta^{\Delta n}}{1 - \delta} T \quad (4)$$

在这里,用 δ 表示统治者收入的贴现率, $\delta \in (0, 1)$ 。在此假设统治者每一期都会选择相同的税收 T ,则 T 就表示定额税收。 n 表示当统治者不进行改革时预期王朝将延续的时间, Δn 表示进行改革之后统治者预期王朝将多存续的时间,再根据贴现公式即可得到(3)和(4)。

在此假定制度变迁的负效用 $U^n = \mu(\beta, t)$ 为努力成本, 令 $U^n = \beta^k t/2$, μ 表示相关利益集团的阻力, 这里形成了对统治者的竞争约束。并且 $\frac{\partial \mu}{\partial \beta} > 0$, $\frac{\partial \mu}{\partial t} > 0$, 这表示 U^n 既是关于统治者改革意愿 β 的增函数又是关于时间 t 的增函数。 $\mu(\beta, t)$ 关于时间 t 递增是因为在一个王朝建立之初, 社会结构处于一种较为混乱的状态, 前朝的利益集团由于政权的更迭而分崩离析, 而新王朝的各级官僚之间的合谋现象还不明显。根据 Tirole (1986) 的观点, 合谋现象随着组织成立时间增长而加深。新的王朝由于人事较新, 相应的利益集团还没有组建起来,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官僚集团之间的合谋现象加剧, 逐渐形成新的利益集团。长此以往必定会对王朝的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形成对统治者进行制度变迁的竞争约束。而 $\mu(\beta, t)$ 也是关于 β 的增函数, 是因为统治者进行改革的意愿和行动力度越强, 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损害就越大, 由此利益集团就越会阻碍制度变迁的进行。综上所述, 统治者的效用函数为: $U_k = U^p - U^n = \frac{1-\delta^n}{1-\delta} T + \frac{1-\delta^{\Delta n}}{1-\delta} T - \alpha e \beta^k - \beta^k t/2$ 。

因此, 统治者进行改革要满足激励约束 $U_k > U_0$ ($k=0$):

$$\frac{1-\delta^{n+\Delta n}}{1-\delta} T - \alpha e \beta^k - \beta^k t/2 > \frac{1-\delta^n}{1-\delta} T - \alpha e - t/2 \quad (5)$$

即只有当统治者进行改革获得的净效用大于不进行改革时就可以得到的既得利益时, 统治者才会有意愿并采取行动去进行制度变迁。由此整理可得:

$$\beta < \sqrt[k]{1 + \frac{2S^n(1-\delta^{\Delta n})}{(1-\delta)(2\alpha e + t)}} \quad (6)$$

从(6)可以看出, 由于时间 t 是不可控制的外生变量, 而其他变量又是常数, 所以激励约束的满足就主要取决于 n 、 Δn 、 e 和 β , 而这几个变量都是由统治者的个人预期决定的。统治者对王朝存续时间的预期 n 是他根据获取的有关社会整体环境的信息判断的。由于统治者常年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 很难直接获取社会信息, 只能通过官僚集团获取二手信息。而信息要想从农民传递给统治者, 需要经过官僚集团的层层传递。在信息传递过程中, 由于官僚之间的合谋现象, 会替彼此掩盖一些不利的信息, 这就导致了统治者与农民之间信息的高度不对称性。因此, 统治者自然会以为农民生活安居乐业, 王朝一派繁荣, 统治者因此就会预期王朝的寿命 n 趋于无限大, 而进行改革使王朝多延续的时间 Δn 趋于有限值, 则 $\sqrt[k]{1 + \frac{2S^n(1-\delta^{\Delta n})}{(1-\delta)(2\alpha e + t)}} \rightarrow 1$ 。显然(6)不能总是满足, 一定会存在大于 1 的 β , 激励约束不可能总是得到满足。

因此, 统治者是不愿意进行改革的。同时, 统治者努力工作的程度 e 也是其对子孙后代的代际偏好的一种体现, 统治者越努力工作, 王朝延续的时间越长, 子孙后代可以获得的利益越大, 因而其进行改革的意愿和行动力 β 也就越大。事实上, 开国之君会具有较高的代际偏好, 但随着王朝的有序发展, 在世袭制下被选择的新任统治者对农民的体恤水平与父辈相比较低, 并且随着官僚集团之间合谋程度的不断加深, 都会导致新的统治者其代际偏好不断降低, 使其进行改革的意愿和行动力 β 也不断减小。综上所述, 统治者的偏好对王朝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的强度和制度变迁的效率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四、统治者的有限理性对制度变迁的影响

在上述模型中, 我们将统治者征收的税赋假定为固定税收。但事实上, 由于统治者是有限理性的, 他追求的是个人效用最大化, 在他付出的工作努力程度 e 既定的情况下, 统治者会希望获取更多

的收入,这时他就不可避免地会提高税率,向农民征收更高的税赋。通常而言,由于封建王朝的初创者经历了多年的战乱,往往会对底层农民的疾苦有更深刻的体会,此时统治者更接近于一个完全理性人,他会更多的考虑社会福利最大化。另一方面,他也希望自己的王朝永远延续下去,而对潜在的竞争对手更加防范,避免其他人也像他一样揭竿而起。基于上述考虑,封建王朝的开国之君就会制定一个较低水平的税赋,既让农民可以休养生息,又为其子孙后代留下足以维持王朝运转的税赋征收标准,这样的结果便是,统治者总会在开国之初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然而,随着王朝的发展日趋安定以及国库开支的刚性增长,继任君主们往往很难像开国君主那样殚精竭虑、体恤民情,致使轻徭薄赋逐渐让位于苛捐杂税。

随着封建王朝的稳定发展,科层官僚体制愈发成熟,科层官僚们作为君主的代理人,行使君主委托的权利,然而,在这个委托-代理链中信息却是高度不对称的,君主只能被动地接受来自官僚的信息,却无法判断这些信息的真伪。即使君主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调查监督官僚的行动,却也不能避免监督人与代理人以及代理人之间的合谋现象。委托-代理模式可以解释造成统治者有限理性的原因。

在封建君主制度下,剩余索取权归君主所有,官僚们领取固定工资,没有任何激励。如果官僚们采取合谋,在支付一定的腐败成本后,就可以获得剩下的全部收益,而由此造成农民造反可能性增加的风险则由君主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官僚是极有可能被现时利益吸引而不去考虑君主的未来收益。因此,官僚之间会进行合谋,欺瞒君主,剥削农民。而君主则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调查成本太高,不可能完全监督官僚的行为,甚至不得不默许官僚的一些合谋,就会造成王朝中后期不断滋生税赋杂派的现象,农民负担越来越重,直至民不聊生、揭竿而起,而愈加愈重的税赋也就成为了压垮农民的最后—根稻草。

与前文模型相似,假定统治者的效用 $U_s = T - C(p, T)$, $C(p, T)$ 为统治者征税的成本,这里将其简化为关于税收 T 和统治者对官僚合谋的容忍度 p 的函数,令 $C(p, T) = T_0 + pT$ 。在此假定税收水平 T 存在高税收和低税收的两种状态,分别用 T^h 和 T^l 表示。容忍度 p 与利益集团的阻力 $\mu(\beta, t)$ 成反比关系, $\frac{\partial p}{\partial \mu} < 0$, 即利益集团的阻力越大,统治者对其容忍度就越低。令 $p = \beta^{-k}/2t$ 。因此,统治者采取低税收的激励约束条件如下:

$$\frac{1 - \delta^{n + \Delta n}}{1 - \delta} T^l - (T_0 + \frac{\beta^{-k}}{2t} T^l) > \frac{1 - \delta^n}{1 - \delta} T^h - (T_0 + \frac{\beta^{-k}}{2t} T^h) \quad (7)$$

整理可得,

$$\beta < \sqrt[k]{\frac{(T^h - T^l)(1 - \delta)}{2t[(T^h - T^l) + \delta^n(T^h - \delta^{\Delta n} T^l)]}} \quad (8)$$

极端地,统治者会预期 $n \rightarrow \infty, \Delta n \rightarrow b_0$ (某个常数)。此时,

$$\sqrt[k]{\frac{(T^h - T^l)(1 - \delta)}{2t[(T^h - T^l) + \delta^n(T^h - \delta^{\Delta n} T^l)]}} \rightarrow \sqrt[k]{\frac{1 - \delta}{2t}} \quad (9)$$

而 t 是不可控的外生变量,所以激励约束不可能总是满足,统治者不会一直采取低税率,因而,统治者总是有积极性征收高税赋,以实现个人效用最大化。由此可见,开国之君的“轻徭薄赋”政策是不会被后续继任者持续沿用的。而统治者在开国之初制定的一系列有利于王朝休养生息、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制度,也会随着王朝的发展逐渐崩塌,王朝制度因之而陷入僵化。这时,为了实现个人福利最大化及王朝的长治久安计,统治者就会试图进行税改,降低税赋。然而,在王朝中后期,官僚集团

之间的合谋已达到一定的程度,而对各种不利于他们的制度变迁进行或明或暗的阻滞,致使各种降低(或减免)税赋的改革难收其效,以致农民的税赋负担不仅没有降下来,反而有不断加重的趋势。黄宗羲曾总结历史上税制改革的三害:“有积累莫反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地之害。”其中,“积累莫反之害”就充分反映了封建王朝中后期实施的各种税改政策的弊端。在税改实行之初,统治者总会进行税目合并和取缔一些杂费项目,期望以此减轻农民的税赋负担,然而税赋却是越改越重。这就是著名的“黄宗羲定律”。税负可以加重、税制可以不改,然而,当统治者的税收达到一定阈值时,就会触发农民暴力潜能爆发的函数,引起农民的强烈反抗。

由于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过高,使得防范代理者——官员腐败在技术上成为不可能的事。在封建君主制度下,因委托—代理链条过长而造成的官僚合谋现象足以使得帝国崩塌。一个帝国虽然需要很长时间才会灭亡,但官僚之间的合谋惯例却形成很快。历史事实一再表明,官僚合谋对农民的剥削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正是官逼民反的主要原因。当农民起义的数量和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这意味着一个王朝灭亡的时日已经不远了。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了统治者偏好、有限理性对封建王朝周期性兴衰的影响,其内在逻辑在于: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影响着制度变迁的效率和进程,并进而影响到王朝的兴与衰。

首先,统治者的偏好影响着制度变迁与制度绩效。统治者的个人偏好对制度变迁起决定性作用,其个人偏好具体表现为统治者进行改革的意愿和行动。当统治者对其王朝寿命的预期值越大,他越没有动力进行制度变迁。这是因为当一个博弈者不知道博弈会在何时结束时,他通常会假定博弈可以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因此,当统治者不知道王朝会在何时灭亡时,由于他缺乏足够的信息让他做出准确的预期,他往往会认为现状可以无限地维持下去,也就会使得统治者假定王朝寿命 n 趋于无限大。另一方面,统治者努力工作的程度还与其代际偏好有关。统治者的代际偏好越高,他越倾向于努力工作,进行改革的意愿越强烈;统治者的代际偏好越低,他越倾向于享乐主义,不在乎王朝的存续时间长短,而在乎个人的享乐至上。

其次,委托—代理治理模式大大约束了统治者的有限理性。作为代理者的官僚及其集团,他们之间的合谋将导致统治者对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高度不对称。因而,统治者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意识不到王朝的制度运行出现问题。信息不对称,恶化了统治者的有限理性程度,直接导致制度变迁的缺位、滞后或实用性太差,使得现有制度的绩效大大降低,既损害统治者的个人福利最大化,更损害社会福利最大化,最严重的后果可能使一个王朝很快出现严重的危机,社会动荡、社会失控,直至王朝的灭亡。

由上述主要研究结论,可以得到两点重要启示:

第一,统治者“政治品格”的重要性。这里的“政治品格”既包括统治者的偏好,更包括影响统治者偏好的个人修养、思维方式、道德水平等。通常,开国君主因为历经长时间战火的洗礼,其忧患和防范意识都比较强,而后任君主生长于宫廷、京城,严重脱离基层民众的生活,缺乏一定的忧患和防范意识。“政治品格”较低的统治者总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去衡量制度变迁的效果,而不是考虑社会福利最大化。承平日久,统治者会逐渐丧失改革的意识与意志,使制度陷入僵化,影响一个王朝的稳定、发展与进步。

第二,信息有效传递的重要性。官僚集团之间的合谋以及利益集团的阻力会造成信息失真,使统治者无法接收到较多的有效信息,从而阻碍制度变迁的有效进行。同时,统治者也不愿意付出巨大的

搜寻成本和机会成本去监督代理人对改革政策的执行情况,这些都会降低制度效率,严重影响王朝社会经济的发展,使王朝不可避免地逐步走向衰亡。因此,要保证社会的良性、向好发展,必须要做到信息的有效传递,只有这样,才能使决策者在信息较为完备的情况下适时作出制度变迁的决策。

参考文献

1. Wang Yu—Chuan: “The rise of land tax and the fall of dynasties in Chinese history”, Pacific Affairs, 1936(9).
2. 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财政税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3. 刘太祥:《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与王朝兴衰周期律》,〔南阳〕《南都学坛》2011年第4期。
4. 黄冬云:《炀帝性格特征与隋王朝的兴衰》,〔南宁〕《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5. 杨德才、靳振忠:《制度效率、制度僵化与王朝周期性兴衰》,《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6.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厉以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7. Olson.M,1993, “Dictatorship, Democracy, and Development”,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7.
8. 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等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9. 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10. Tirole.J,1986, “Hierarchies and Bureaucracies On the Role of Collusion in organizations”,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2(2).
11. 曼瑟·奥尔森:《权利与繁荣》,苏长和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4年版。
12. 黄宗羲:《明夷仿制录·田制三》。

〔责任编辑:天 则〕

The Preference and Limited Rationality of a Ruler and the Periodic Rise and Fall of a Dynasty

Yang Decai Liu Bingjing

Abstract: The periodic rise and fall of a dynasty has become a hot issue in the field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historical study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violent potential theory and Olsen North's origin of the state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ory and model,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preference and limited rationality of a ruler play a decisive role in the institutional change. The rulers' preference and limited rationality make rulers give priority to their personal interests over social welfare while making decisions on institutional changes, which leads to low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However, the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determin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periodic rise and fall of a dynasty.

Keywords: institutional change; institutional efficiency; intergenerational preference; limited rationality; periodic rise and fall of a dynasty